

新见唐宋砚图说

萧高洪 著

中国砚文化丛书

目 录

唐宋名砚新说(代前言) 萧高洪(1)

一、唐 洪州窑双管多足瓷砚(6)

二、唐 洪州窑多足瓷砚(6)

三、唐 长沙窑褐釉辟雍形瓷砚(8)

四、唐 长沙窑羊形瓷砚(9)

五、唐 越窑箕形砚(11)

六、唐 支架形澄泥砚(12)

七、唐 箕形陶砚(13)

八、唐 凤字两足形陶砚(14)

九、唐 龟形陶砚(15)

一〇、唐 箕形澄泥砚(16)

一一、唐 澄泥正背两用砚(16)

一二、唐 椭圆形端砚(18)

一三、唐 凤字形端砚(19)

一四、唐 凤字绿端石砚(20)

一五、唐 莲瓣形歙砚(20)

一六、唐 箕形歙砚(22)

一七、唐 箕形石砚(23)

一八、唐 凤字带研石紫石砚(24)

一九、唐 凤字形紫石砚(25)

二〇、唐 凤字形石砚(26)

二一、唐 凤字石砚(26)

二二、唐 凤字形石砚(27)

二三、五代 箕形端砚(28)

二四、南唐 箕形抄手歙砚(29)

二五、南唐 长方形金晕歙砚(30)

二六、宋 “天圣七年”款石砚(31)

二七、宋 “治平元年”款细罗纹歙砚(32)

二八、宋 至和年款歙石天砚(33)

二九、宋 曾巩用端砚(35)

三〇、宋 元祐六年款东坡砚(36)

三一、宋 “元符三年”款紫石砚(38)

三二、宋 淳熙七年款双履石砚(39)

三三、宋 “淳熙十年”款青石砚(40)

三四、宋 “淳熙拾叁年”款瓶式端砚(41)

三五、宋 “嘉泰三年”款紫石砚(42)

三六、宋 开禧元年纪年钟形端砚(43)

三七、宋 “端平元年”款紫石砚(44)

三八、宋 “庚午”年款端砚(45)

三九、宋 丙申年款石砚(46)

四〇、宋 “己酉”干支年款紫石砚(46)

四一、宋 下岩抄手端砚(48)

四二、宋 椭圆形端砚(49)

四三、宋 九眼抄手端砚(50)

四四、宋 船形端砚(51)

四五、宋 莲叶池端砚(52)

四六、宋 抄手端砚(53)

四七、宋 端石抄手砚(54)

四八、宋 杉木纹端砚(55)

四九、宋 火捺纹太史式端砚(56)

五〇、宋 “晋卿”铭端砚(57)

五一、宋 多眼端石抄手砚(58)

五二、宋 太史式端砚(59)

五三、宋 太史式抄手端砚(60)

五四、宋 双池端砚(61)

五五、宋 下岩抄手端砚(62)

五六、宋 琴式端砚(63)

五七、宋 抄手式端砚(64)

五八、宋 下岩端砚(64)

五九、宋 钟形池抄手端砚(66)

- 六〇、宋 马蹄形端砚(66)
- 六一、宋 绿端石砚(68)
- 六二、宋 抄手端砚(69)
- 六三、宋 长方形绿端砚(70)
- 六四、宋 “及第”款端砚(71)
- 六五、宋 黄眼抄手端砚(72)
- 六六、宋 瓶样抄手端砚(73)
- 六七、宋 “罗(押)”款风字端砚(74)
- 六八、宋 端州石砚(75)
- 六九、宋 耳杯形抄手端砚(76)
- 七〇、宋 抄手歙砚(77)
- 七一、宋 人面形眉纹圆歙砚(78)
- 七二、宋 履形池罗纹歙砚(80)
- 七三、宋 单履形池歙砚(81)
- 七四、宋 长眉子歙砚(82)
- 七五、宋 椭圆形歙砚(83)
- 七六、宋 雁湖枣心眉圆歙砚(84)
- 七七、宋 琴样歙砚(85)
- 七八、宋 “国材”款歙砚(86)
- 七九、宋 半瓦形双池歙砚(87)
- 八〇、宋 鱼子金晕抄手歙砚(88)
- 八一、宋 抄手金星歙砚(88)
- 八二、宋 “伯安”款抄手歙砚(90)
- 八三、宋 刷丝纹歙砚(90)
- 八四、宋 鱼子金晕银锭形歙砚(91)
- 八五、宋 歙石砚板(92)
- 八六、宋 鱼子纹椭圆形歙砚(92)
- 八七、宋 椭圆宝瓶形歙砚(93)
- 八八、宋 水波眉纹歙砚(94)
- 八九、宋 腰果形池歙砚(94)
- 九〇、宋 红丝石圆形砚(95)
- 九一、宋 洮河石城池砚(96)
- 九二、宋 月池洮河石砚(98)
- 九三、宋 红绿双色洮河石砚(98)
- 九四、宋 吕道人制澄泥砚(100)
- 九五、宋 瓶式澄泥砚(102)
- 九六、宋 虾头红澄泥砚(103)
- 九七、宋 制铜雀台瓦砚(104)
- 九八、宋 有脚风字形吉石砚(106)
- 九九、宋 永州龙须金山石砚(107)
- 一〇〇、宋 方形修口石砚(108)
- 一〇一、宋 抄手苍黑石砚(109)
- 一〇二、宋 抄手青玉砚(110)
- 一〇三、宋 青玉砚(111)
- 一〇四、宋 影青四足长方形瓷砚(112)
- 一〇五、宋 影青正方形瓷砚(113)
- 一〇六、宋 影青圆形瓷砚(114)
- 一〇七、宋 影青点彩瓷暖砚(115)
- 一〇八、宋 吉州窑瓷砚(116)
- 一〇九、宋 箕形吉州窑系褐色瓷砚(116)
- 一一〇、宋 残款箕形石砚(117)
- 一一一、宋 抄手石砚(118)
- 一一二、宋 圆镜形三足石砚(119)
- 一一三、宋 古钱样石砚板(120)
- 一一四、宋 船形石砚(120)
- 一一五、宋 马蹄形青石砚(121)
- 一一六、宋 “五十太”款抄手石砚(122)
- 一一七、宋 蝉形石砚(123)
- 一一八、宋 嵌石箱式紫石砚(124)
- 一一九、宋 嵌石箱式石砚(124)

- 一二〇、宋 双面淌池紫石砚(126)
一二一、宋 如意池丹石砚(127)
一二二、宋 圆形方池石砚(128)
一二三、宋 圆形风字形石砚(128)
一二四、宋 星座图饰紫石砚(129)
一二五、宋 鱼乐图紫石砚(130)
一二六、宋 城池石砚(131)
一二七、宋 辟雍形石砚(131)
一二八、宋 鲤鱼跃龙门砚(132)
后 记(134)

唐宋名砚新说

(代前言)

萧高洪

唐宋时期是指包括五代十国在内的一个历史时期,从618年李渊称帝建唐始,至1279年元灭南宋止,时跨666年。由于受朝代更迭、施用、收藏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文房所使用的砚台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也发生了若干嬗变,沉浮消长,难以捉摸,原来声名显赫的澄泥砚,由于历史背景的转换,而失去往日的荣耀,而隐居深山大河中的石材,渐渐显示出特有的优势,成为艺人文房中的最爱。唐宋名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唐宋名砚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唐代诸名砚

唐代甚重澄泥砚,澄泥砚是由陶砚发展而来的一种制砚工艺,据说其工艺源于秦汉时期建造宫殿的砖瓦,世传东汉末年铜雀台“瓦俾陶人澄泥,以稀滤过,加胡桃油,方埴埴之。”(苏易简《文房四谱》)唐代澄泥砚之制作方法就是

在这一基础上加以改进制造出来的,成书于雍熙三年(986)的苏易简《文房四谱》,对澄泥砚的工艺作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共有十余道工序。雍熙三年,宋朝还刚刚建国不到30年,故其关于澄泥砚的工艺实自唐、五代而来,而不是在宋建国伊始才形成的。

唐朝是当时的东方大国,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对文房用品的需求量大增,遂形成以虢州、绛州、青州(潍州)等为各自中心的生产基地,其各有自己成功的秘诀,如绛州澄泥砚,“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张洎《贾氏谈录》)指的是其采用特殊的过滤方法。而青州(潍州)澄泥砚则是“土人取烂石研澄其末,烧之为砚。”(唐询《砚录》)石较泥为坚,将其研成粉末加入澄泥砚中,以提高澄泥砚的品质。总体而言,澄泥砚改变了以往陶砚原料单一化的状

况,被认为是“含津溢墨”的文房佳品,虢州所产还取得了贡砚的地位,唐杜佑《通典》谓虢州贡“砚瓦十具”。欧阳修《唐书·地理志》亦谓:“虢州土贡瓦砚。”而欧阳修在其《砚谱》中同时有“唐人品砚以为第一”的记载。欧阳修用了“品砚”两字,这说明砚台的品评迟至唐代就开始了。有了品评,观点自会有异同,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亦“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旧唐书·柳公权传》)可见,经焙烧的澄泥砚在唐代文房用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深受士林的喜爱,清朱栋说:“唐初书家林立,大概多用陶砚,而其品特珍。”(朱栋《砚小史》)则概括了唐代文人用陶(澄泥)砚的实际情况。

就在澄泥砚广为使用的同时,石砚也慢慢地闯入文人世界,并逐渐显示出固有的品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端州羚羊峡的石砚开采于唐初,最早见于宋人唐询《砚录》的著录,其谓“龙岩乃唐初取研处。”而关于端砚的名字更是频频出现在唐代的作品中,《全唐诗》就收有不少这方面的诗作,以下试举若干

咏赞端砚的名句,如刘禹锡有“端州石砚人间重”、“寻常濡翰次,恨不到端溪”。李贺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释齐己有“端人凿断碧溪浔,善价争教惜万金”。徐夔有“远向端溪得,皆因郢匠成”。皮日休有“微润将融紫玉英”。陆龟蒙有“澄沙脆弱闻应伏,青铁沈埋见亦羞”。徐鉉有“请以端溪润,酬君水玉明”。许浑有“长溪抱碧岭……洞丁多斫石(许浑原注:端州斫石)”。李琪有“远来柯岭外,近到玉堂前”。尤其是文嵩,还以拟人手法作《即墨侯石虚中传》,将端砚之发现、产地、砚色、砚质、砚品、砚德等——加以形象描述,脍炙人口,广为士林传颂,其“究墨之妙,穷笔之精”对端砚的赞美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文学家的笔下,端州石砚尽管远在岭外,尽管开采困难,尽管价格不菲,但她以其色美、质优、发墨等品德已成为“天下无贵贱通用”(李肇《唐国史补》)的文房用品,成为文人书房之助的钟爱之物,成为人人想方设法得到的名砚了。

龙尾砚,产于婺源县,因婺源属歙州,故又称歙砚,始开于唐玄宗开元(713—741)

年间，据唐积《歙州砚谱》记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斫为砚，由是山下始传”。这是歙砚从发现到开采的大致情况。而据宋人陶穀《清异录》的记载，开元二年（714），唐玄宗就曾用歙砚赐予宰相，这一资料证实，极有可能歙砚的开采要早于开元年间，而庄南杰、刘禹锡等也有歌歙砚的诗作，使其成为继端砚之后的又一名石砚。

二、五代十国时期一歙砚的崛起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我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时代，各政权割据一方，相互混战，各地澄泥砚的生产均受到影响，市场的萎缩，导致了各自质量与产量的下降。端州地属南汉，该国侵伐无虚日，内乱成积习，端砚的开采倍受创伤，宋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干脆用“石竭”来概括当时的情景，因无心无力经营，使许多砚坑濒于荒废倒闭。

与澄泥砚及端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歙砚的开采，在这

一时期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南唐叶边35州，歙州为其一，统治者重视发展生产，使经济文化出现繁荣的景象。史家称南地上看都比一般陶砚细政权之冠。宋人著述中较多地涉及南唐歙砚开采的盛况，欧阳修谓：“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给，号砚务官，岁以官选砚有数……其石尤精……”（《欧阳修全集·试笔》）而这一情节在唐询、唐积与陈师道等人的著作中也有记载，唐积《歙州砚谱》曰：“至南唐元宗（李璟，943—960年在位）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砚，并蒸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这时，由官方组织开采，一些优质坑口相继开凿出来，歙砚名声日著，至李后主（煜，961—975年在位）“留意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砚石，三者为天下冠。”（唐询《砚录》）我们注意到，北宋建立后，李璟与李煜只称国主，奉北宋朝正朔，故歙砚“冠天下”反映的应是宋初的情况。

三、两宋名砚家族中的新成员

据史料记载，宋砚多达数十品种，而石砚取得主导地

位,端、歙入宋以后进入正常发展轨道,一直处于优势,这与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正比例。值得关注的是在石砚家族中又有新的名品产生。

1、红丝砚。嘉祐六年(1061),唐询知青州,在益都县墨(一作黑)山找到了唐中和年间取石的坑口,其间的二百余年无人问津,唐询差人取石,在两年间仅得五十余方,此砚他命为红丝石砚并品为第一,而其在《砚录》中前4名的排序依次为:红丝石砚、端砚、歙砚、归州大沱江石砚。当时洮河砚未出,故无名。有资料表明,唐询虽身为青州太守,但他遣人于墨山取石,纯属个人行为,官方不曾介入,因此,当唐询离任后,取红丝石的坑口又遭废弃。其以红丝石砚为第一的提法在宋代最富争议性,非议迭出。颇有戏剧情节的是由唐询之论还引出一段关于红丝砚的公案,其大致情况是:红丝石砚不仅是宋代第一名砚,而且还由此演变成唐代四大名砚之一,且被冠于砚首的重要位置。然而,对产生这一说法的历史背景稍作了解就不难发现,原来是持论者在引用《旧唐书·柳公权传》中

柳公权评青州石末砚为第一时脱一“末”字,这一错误最初出现在宋李石《续博物志》与李之彦《砚谱》中。更有甚者是将明王世贞《委宛余编》所云“柳公权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绛州者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一段论砚文字认为是本身就事属子虚的柳公权《论砚》中的内容,如此一来,红丝砚、端砚、歙砚与洮河砚便成为唐代所谓的四大名砚。而不知者将其与唐询的观点联系起来,更加深了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复杂程度,以讹传讹以至于今。

2、洮河砚。洮河石在唐代系贡品中的一种砺石,但其原产地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在安史之乱后为吐蕃所占领,至宋熙宁年间(1068-1077)王韶率军大败羌人,才为宋所用,当时,“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给他道。”(《宋史·王韶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资“六百钜万”用以开采洮砚,从而使宋代文人文房又增加了新的品种,其以色美质优而倍受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知名人士好评,王韶之后此地边患不断,而南宋时期,朝廷更是无力顾及,洮河砚的开采也自行

放弃，故南宋时其已成稀见之物，赵希鹄称其“为无价之宝。”（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可见，洮河砚在宋代系名符其实的名砚。

3、凤味石砚。大约在洮河石砚名动中原之时，建州延平（治今福建南平市）的凤味砚因苏东坡的备加赞美而名声雀起，其石“声如铜铁，作砚至美，如有肤筠然”。（《东坡题跋》）像唐询对红丝石砚情有独钟一样，其也是代表苏东坡个人的观点，“然论者多异同”（同上）不过，他的“坐令龙尾羞牛后”得罪了歙人，以致于后来苏东坡“使人求砚于歙”，被歙人所回敬，“卒不得善砚”。（同上）

在宋代变化最大的是澄泥砚，唐询在《砚录》中率先提出其“出于陶灼，本非自然，乌足道哉”的评论，欧阳修在《砚谱》亦谓：“青州、潍州石末研，皆瓦砚也，其善发墨，非石砚之比。”又谓“虢州澄泥……今人罕用矣。”也是站在同一立场，苏东坡进而指出：“（青州石末砚）凡物耳，无足珍者，盖出陶灶中，无泽润理……岂砚材乎。砚当用石，如镜用铜，此真材本性也。”（《东坡题跋》）大势所趋，澄泥砚在宋代

文房用品中已失去了往昔的辉煌。而惟一例外是泽州（今山西晋县城）吕道人所制澄泥砚，其曾造墨于常山（今恒山），有异人教以制澄泥砚，“研成坚润宜墨，光溢如漆。”（何薳《春渚纪闻》）名重一时，据《东坡题跋》，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被贬地黄州访得一方，其跋语中有“道人已死，砚渐难得”的话，知吕道人此前已去世。吕砚也是昙花一现，并未造成对澄泥砚在宋代的振兴产生影响，因其法不传子，而后仿者质量又过不了关，故其所造“以金铁划之不入”的工艺在他去世后也失传了。

四、结语

如上所述，唐宋666年间，文人所使用的砚台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历史表明，唐代名砚与宋代名砚是有所不同的，唐代的名砚为虢州砚瓦（澄泥砚）、青州石末砚（澄泥砚）、绛州黑砚（澄泥砚）、端砚和歙砚。宋代的名砚为：端砚、歙砚、红丝石砚、洮砚、凤味砚与吕砚（澄泥砚）。就名砚而言，也存在着新陈代谢，反映在唐宋时期的不同的是：唐代以澄泥砚为主，而宋代是石砚的天下。

一、唐 洪州窑双管多足瓷砚

笔、墨、纸、砚谓之文房四宝，四宝之中，砚之用材或陶、或瓷、或石或金属，质坚而固，具有传万世而永存的品质。古砚承载着中国特定的文化信息，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历来为收藏爱好者所青睐。

唐承魏晋之绪，文房用砚多为陶、瓷质。图中这方瓷砚系唐代洪州窑的杰作，砚呈圆形，面径12.6厘米，高4.6厘米，砚心上凸，略高于砚缘，砚心与砚缘之间形成环形砚池，腹部圆鼓，砚缘周围整齐排列着一圈共16只兽蹄足，另有双管附于砚缘，用以插笔，砚身施釉，黄褐色，砚心及砚底露胎，砚心瓷质细腻，便于磨墨。此砚造型丰满，加之多足，观之气象森然，似乎在精心营造一种博大的氛围，体现出大唐风范。

此砚的形状与周之辟雍型制相类，故将这一类型的砚式称为辟雍砚。唐宰相杨师道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诗句，给它以形象的描述。

唐代用砚世所珍，若是文房拥有这样一方辟雍砚，真乃人生一大快事。



二、唐 洪州窑多足瓷砚

唐代的江西，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开始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就全国而言，其不仅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而且在陶瓷、矿冶、造船与纺织等行业都有着较优势的地位。洪州窑在当时为江南一大名窑，窑址位于今丰城市罗湖一带。丰城为洪州属下，罗湖距南昌城约30公里，地处赣江西岸边，水运便利，其生产历史从东汉至晚唐五代，长达800余年，生产



的瓷器早期以青绿、黄绿釉为主，晚期多酱褐和黄褐釉。在唐陆羽的《茶经》中曾提到洪州窑的茶碗，唐玄宗天宝（742—755）初年，水陆转运使韦坚奏请将江淮凡数十郡土特名产运进京城，以供皇帝检阅，其中“豫章郡（洪州）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被选送，《（旧唐书·韦坚传）》名动京城，深得皇帝及文武百官的赞赏。瓷砚也是洪州窑的传统产品，这方瓷砚面径22

厘米、高7.5厘米，呈圆形，砚心上凸，形如圆形面包，周沿低下，边唇直口，下有六只兽足，对称分布，砚心露胎，胎色白，质细腻，其余部分均施青绿釉，釉汁莹润。

唐代各大名窑都有瓷砚的生产，产品求同存异，洪州窑的瓷砚以圆形有足者为主，一般面径在15厘米左右，面径在20厘米以上者为少见，此砚体大而俊，为难得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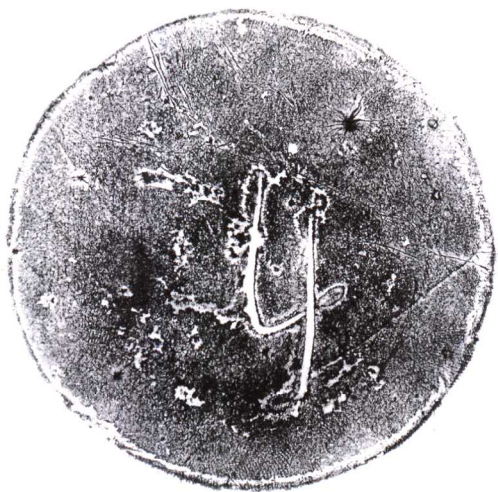
三、唐 长沙窑褐釉辟雍形瓷砚

长沙窑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所以，“长沙窑”又叫“铜官窑”或“瓦渣坪窑”。又因其位于石渚湖一带，在唐代诗人李群玉的诗中称之为“石渚”（今作“石渚”）窑。长沙窑开创了我国陶瓷史上釉下彩绘的先河，它为唐、五代时期南方的一处重要青瓷窑场，同时它还肩负起我国瓷器对外贸易的重任。

图中这方瓷砚系长沙窑的佳作，砚面直径18厘米、砚底直径19.5厘米、高5.5厘米。砚池内凹如碗，边缘开槽，腹空，砚周有竹节45根，竹节系随手用篾器所削开，粗细不一，均作右倾状，砚池外均施釉，砚池露胎，池心可见7个垫（叠）烧焦黑状的支钉痕。此砚硕大，体现了大唐帝国国力强盛的景象。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曾谓：“古人晨起，必浓磨墨汁满砚池中，以供一日之用……故研池必大而深。”此可见之。值得一提的是，该砚的腹背刻有一阿拉伯数字“4”字，其记录了中国瓷器在唐代与西亚地区阿拉伯人交往的历史。

人们知道，自0至9十位

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但却是古代印度人的发明，他们还发明了现在一般通用的定位计数的十进位法。十个数字符号后来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称为阿拉伯数字，沿用至今。唐帝国时，许多阿拉伯人来中国经商，甚至定居，阿拉伯数字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长沙窑的产品在今伊朗的波斯台岸的西拉福、达依尔，以及内陆的尼夏普尔、伊拉克和以东的许多国家均有发现，说明长沙窑的产品已远达这些阿拉伯国家。交流的性质在于互为影响，因此，长沙窑瓷砚上刻有阿拉伯数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唐 长沙窑羊形瓷砚

唐代长沙窑生产的砚台颇具特色，就笔者所见，其动物造型的就有螭、虎与羊诸式，图示即为一件以羊造型的砚台。

砚台的主体系一羊作平卧式，羊首抬起向右侧望，羊首的两侧各置一管，弯曲的四条腿依稀可见，羊尾上翘承托着砚体。头为砚首，羊背及羊尾负载着箕形砚体，羊颈为砚池，用利器刻出许多羊毛，柔

而有飘动之感，砚池略高于砚堂，砚堂为斜式，前低后高。羊身、双管、砚池及砚堂尾部各施青釉，砚的两侧沿边及砚堂四周均施褐釉，砚堂中心部分与砚底露胎，砚堂磨墨处瓷质细润。该砚长13.6厘米、前宽4.8厘米、后宽7.8厘米、高5.8厘米。“羊”是吉祥的“祥”古体，古器物中“吉祥”二字多写成“吉羊”，在民俗文化中羊本身就是祥物，羊是十二生肖之一，古人用羊头悬于

门上，以避灾兆瑞。又“羊”
“阳”同音同声，“三阳开泰”旧
时为一年的吉祥语。

以羊为砚，古人祈求祥瑞
的心理可谓深矣。





五、唐 越窑箕形砚

越窑是指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时期越州窑这样一个前后连贯的瓷窑体系。仅从茶碗而言，唐陆羽的《茶经》认为越窑所产是最好的，其优于邢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和洪州所产，其在比较越邢之优劣时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更赞道：“九秋风

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主要生产青瓷，釉色青中微带黄色。

这是一方唐代的越窑瓷砚，砚长12.6厘米、宽11.5厘米、高3.1厘米。制如箕形，淌池，砚首上跷，砚边与砚堂交接处无明显折痕，系缓缓过渡，砚首底落地，砚尾底部成一字足着地，砚体周身施釉，惟砚面左后方留一三角形状面露胎，釉色青中闪黄，可见细小的开片，胎质灰白，稍粗，做工亦粗糙，当视为越窑系中一土窑的产品。

六、唐 支架形澄泥砚

澄泥砚的生产工艺十分考究，古籍中多有涉及，宋苏易简作《文房四谱》，其中的《砚谱》被誉为是砚之有谱始作俑者，他对澄泥砚生产过程论述为：以水澄泥、加料、捣熟、模制、加工、焙烧、气蒸成砚。应该说苏氏的记载也间接地反映了唐代澄泥生产的一些状况。

图中这方唐代支架箕形砚，不同于当时广为流行的双足箕形砚，其在结构上，似为砚体与支架两部分构成，砚体扁平，斜面内弧成凹，支架较高，承托着砚体，支架随砚而前窄后宽，架高也微向前倾，后高前低，支架中空，箕砚悬置其上，砚缘略高于支架，支架的四周用利器镂空，图案类似于心型，前后各2孔，两侧各3孔，以为装饰，这样既减轻了重量，又使本可能封闭的四跗变得美观，为了避免板滞，还于支架上方四周及侧面刻划了线纹。而近身镂空的双孔，正好可供食指和中指插入，这似乎向人们昭示，正是唐宋交替之际抄手砚的一种过渡形态。该砚既保留了箕形的原始意味，又融入了抄手意念，砚台本身不仅被托高



了，而且也减轻了份量，不惟烧制方便，也便于携带。

无独有偶，它这种造型结构与法门寺出土唐放置灵骨的玉棺如出一辙，玉棺也是用支架托起，而且支架亦被镂空，正是如此，才使之显得肃静庄重；可以说这方支架形澄泥砚与其一样，是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该砚长12厘米、前宽8.7厘米、后宽9.5厘米、高3.8厘米。色灰中泛白，从其表面特征看，未见土锈斑，盖长为流水呵护所致。

该砚为它谱所未见，在设计理念上颇为新颖独到。



七、唐 箕形陶砚

流行于唐世的陶砚，在唐代文人笔下也时有出现，韩愈《毛颖传》谓：“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毛颖指笔、陈玄指墨、陶泓指砚，褚先生指纸，皆为拟托人名。陶泓在此实应指瓦砚，后其也成为砚的别名。韩愈还有一篇《瘞砚文》甚为著名，讲的是陇西李元宾友人送他一方陶砚，朝夕为伴，“悲欢否泰未尝废用”，后在外地由于差役的一次失手而遭坠毁，“乃匡归埋京师”。“瘞”即埋葬的意思，砚与文人相亲相伴，打破了还要以礼相待，能不叫人动情乎，故韩愈赞之曰：“土乎成质，陶乎成器。复

其质，非生死。类全斯用，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与瓦砾异？”“土乎成质，陶乎成器”，说的就是陶砚。看来，只要是心爱之物，也就顾不得什么材质了。

图中即是一方唐代的陶砚，砚长17.3厘米、宽8.3—11.3厘米、高3.5厘米。色灰，模制，砚堂两侧及前端起边，砚首呈四角突出状，砚额及砚尾分别上翘，略呈前低后高之势，淌池，抄手处如拱桥形。此外，砚首还模印花饰，三朵盛开的鲜花十分迷人。该砚泥质加工颇见细腻，磨光手感润滑，可视为唐代陶砚中的精品之作。